

對古代西北的認識

金 惠

一、中國民族與文化的起源地

中國民族的起源，雖然立說紛紜，到現在止，還是假說階段，但從我國自古以來的神話、傳說、史籍所載，以及近數十年來自地下發掘出來的證物，都足以說明中國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是在西北，則為可信的事實。神話中所說最早的共工，高辛（或祝融）和女媧、相柳等的故事，固然發生在崑崙之丘，崑崙之墟，也就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；還有華胥氏曾在雷澤（今山西永濟縣南）踏過大人足跡受孕的庖犧氏，是出生於甘肅秦安縣北（即成紀）。又如「感神龍而生」的炎帝，與「履帝武敏」而生的后稷，其故事的起點也都在陝西境內。此外，傳說中的天、地、人三皇（註一），依遁甲開山圖，天皇的根據地是崑崙山，蜀本誌則說：「三皇乘祇車出谷口」；依三國人秦泌的考證，所謂谷口，就是斜谷。再依華陽國志、十三州志都認為「蜀之先，肇於人皇之際」；可見三皇都曾由陝西到過四川。這些神話、傳說，並非從天上掉下的，事實上多已從地下發掘出來的證物所印證。從此可見中國民族與文化起源於西北，確是無可懷疑的了。因為中國民族與文化固是複雜而多元的，但從新石器時代開

始以來，中國民族的主幹與文化的主流，據一般學者的認定，就在今日黃河、長江的上游，以黃河區為中心的青海、甘肅、寧夏、綏遠、陝西、山西及四川一帶高原，形成它最初的原型。所以章太炎先生曾說：「華夏起於雍梁」。雍、梁同為古時九州之一，雍州有甘肅、寧夏、青海三省及陝西北部之地，梁即今四川全省和陝西省南部都是。章先生所以如此斷定，是有下列各項基本事實的根據。

(一)種族的標誌有三：體質、語言、文化。我國地質調查所前在甘肅所採掘的新石器時代之人骨化石，與河南渾池縣仰韶村所採掘的，據解剖學家步達生博士（Dr. Davidson Black）前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）的研究，認為與現代華人的體質非常相似，可以說是現代華人的直接祖先。他在「甘肅史前人種說略」一書中說：「此種人東移而成為中國古文化的主人翁」。至於有以前在北平附近發現的「北京人」為中國人的祖先，實在是一大錯誤，因為它是冰河時代的猿人，自不能與真人相比論，何況「北京人」遠在五、六十萬年以前。那時以後的人類，經過冰河時代四次進退的巨變，將人類驅向南方及東西分散，多數早已絕跡。北京人死後二十萬年，真正的舊

石器時代文化方才開始。

語言之為種族的重要指標，不在體質之下。言語學家指出中國人與今日的西藏人、苗人、泰人、及大部越南人、緬甸人，屬於一個系統——即漢藏語系，因此，可使我們知道我國民族最古的血緣關係。雖然藏緬語法略有不同，而考古學家指出我國民族最古活動遺跡，至少在新石器時代，確在甘肅、青海及川北、陝、晉一帶，即中國文化最古中心是在黃河和長江的上游。這也可明白古代漢、藏人祖先的地位與今日大不相同。

(二)甘肅一帶延覆黃河兩岸的黃土區域（大概是在冰河時代的乾冷時，由北部的風吹來灰土累累而成），只要加以雨水便很肥沃，最易發展農業。民國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，法國神父桑志華（E. Licent）德日進（Teilhard De Chardin）和楊鍾健先生，在黃河河套和長城以北地區，發掘了許多舊石器時代的遺跡。當時發現的地點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寧夏城南水東溝和綏遠鄂爾多斯的沙拉烏蘇河岸。水東溝的石器有石鋤、石犁、鶴嘴鋤等，附近還有毛象、披毛犀、扁角鹿（以上已絕種）野驢、赤鹿等。又瑞典人安特生（C. G. Andersson）於民國二十三年、二十四年（一九三四、三五年）間，到

甘肅、青海等地發掘出古代村落的遺址，及先民葬地。出土遺物有石斧、石簋、琢磨玉片，與許多繪有花紋的陶瓶、陶器及小銅器、骨器、骸骨等，從這些出土的遺物，可以知道華人的祖先，于一萬年前，至遲在公元四、五千年以前即已在此區域定居種植，並飼養家畜。再賈稱：「雍州黃壤」，雍州素祭黃帝，安特生博士說中國人為「黃土的子孫」，可以說是有所本的。由於他所採掘出來的石器加以考證，最古的有甘肅的齊家村，次為河南的仰韶期與遼寧沙鍋屯的石器，以考古上的證據來推論，華族祖先移動的路線，當可假定中國民族在舊石器末期或新石器初期，已在甘肅一帶與黃河流域南部幾省，成為屯聚的中心，那裡因為氣候、土質和地勢的優良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搖籃。俄國的沙發諾夫也曾說：「原始的移民，從中亞細亞帶來了為適度到農業所必需的『一點文化的萌芽，祇有在黃土區域的條件之下，終能發展而成為獨立的經濟力量』」。

(二) 中國的早期陶器，除殷代白陶屬於金屬時代的作品外，新石器時代有彩陶（紅陶）、黑陶、灰陶（拍紋陶）三種。這三種陶器的分布區域，以彩陶為最廣，它分布河南省的西北、陝西、山西、甘肅、青海和四川省西北部的理番，以及長城一帶，遼東，乃至新疆、香港，黑陶分布於山東、河南、杭州、遼東，且不純粹的出現於山西省的南部和甘肅，灰陶分布於河南、淮壽、遼東、陝西、甘肅等處。這三種陶器分布的範圍雖廣，而彩陶却為中國遠古文化的主流，它以西北為中心，固不待說，即黑、灰二種陶器，也在陝、

甘、河、洛一帶會合。又據石璋如先生在大陸雜誌先後發表「中國彩陶文化之解剖」及「新石器時代之中原」二文中所說，以為彩陶係在神農族區域，灰陶在伏羲族區域，黑陶在燧人族區域，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事。

(三) 中國文化特異標誌的蠶絲，是起於四川北部的松潘一帶，李濟先生於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在山西夏縣發現一個半割似絲的殼，極像蠶繭，這也可以表示中國遠古文化傳播的軌跡。

(四) 中國古代人最重視的兩個神聖器物：一是玉圭，一是銅鼎。我國古代祭神都用玉圭，在民間更用以避邪。左傳云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。周禮大宗伯：「以黃琮禮地」。典瑞謂：「兩圭有邸，以祀地」。鄭注：「祀地，謂所祀於北郊，神州之神」。而玉為西域的產物。中國最古的兵事，主在防戎，而戎在西北（原氏羌）。正因中國民族起於西北，受戎狄的壓力，才漸移向東南。可是這一遷移非但沒有影響民族生存，而且使農業發達。惟一旦遇有水患或外族侵入，仍要西向而爭。所以古代帝都，常在河城東西反復遷徙。通觀歷史，也是這種趨勢。

(五) 再據史籍所載，三皇時代的活動範圍，即中國民族的祖先，至遲於公元前四、五千年前就在甘肅、四川、陝西、山西，乃至青海、寧夏一帶進入農耕。後因繁殖或受壓力，向黃河中、下游移動。他們集中於河渭、河洛、河淮三個區域，分為有巢、燧人、伏羲、神農等諸氏族。後列兩個最大的部落同盟，約於公元前三、五〇〇年前，一是移殖黃河下游較早的伏羲族，伏羲族據

說起於仇夷山（在甘肅），後遷河南。二是東移較晚的神農族，神農姜姓，初起於西方，後移至河南、湖北交接地帶（烈山在鄂北，烈山即焚山為火耕）。

至於黃帝的活動區域，有如左各項記載：

(一) 史記五帝本紀：「黃帝居軒轅之丘，而娶於西陵之女，……黃帝崩，葬橋山」。集解引皇甫謐曰：「（黃帝）受國於有熊，居軒轅之丘，故因以為名，又以為號」。考水經渭水注，引姚鼐言：「上邽東七十里有軒轅谷，軒轅谷水出軒轅溪，注渭」。又山海經謂：「軒轅之丘，在軒轅國北」。按上邽即今甘肅天水西南，西陵氏女即蜀山氏女，生長於川北。橋山，地理志謂：「上郡陽周縣橋山南，有黃帝冢」。有熊則在今河南新鄭。於此，足見黃帝實興於中國的西北。

(二) 五帝本紀又云：「軒轅之時，神農氏世衰。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農氏弗能征。……軒轅乃修德振兵，……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三戰，然後得其志。……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遂擒殺蚩尤。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，代神農氏，是為黃帝。天下有不順者，黃帝從而征之，平者去之，披山通道，未嘗寧居。東至於海，登丸山（即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），及岱宗（即泰山），西至於空桐，登雞頭（在隴右，大隴山之異名）。南至於江，登熊、湘（即熊耳山和湘山）。北逐葷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於涿鹿之阿。遷徙往來無常處，以師兵為營衛」。

根據上載，黃帝曾經東至山東半島，西抵甘

肅，經過陝南、豫西南而達湘北。因黃帝此時，已經擊敗炎帝族，和蚩尤族，即以涿鹿為根據地，與各參戰氏族共慶勝利，所以史記索隱以為「合諸侯於涿鹿，而朝之於釜山」。(涿鹿、釜山，都在今察哈爾省境內，一為懷來縣，一為涿鹿縣)。

(三)輿地記：「涿鹿本為彭城，黃帝初都，遷有熊也」。五帝本紀索隱以為「都軒轅之丘」。水經渭水注，引姚鼐說，則以為都陳倉。其實黃帝當時，正是農牧經濟時代，自無固定的都邑。原來本紀中曾說：「遷徙往來無常處，以前兵為營衛」。即可說明那一時代的特色。唯黃帝既生於天水，則陳倉(即今陝西寶雞縣)與天水同屬渭水流域，相距僅百餘公里，是以黃帝一族發軔於西北，當無可疑。

(四)賈子新書修政篇：「黃帝涉流沙，登於崑崙」。瑞應圖：「黃帝時，西王母獻白環」。按流沙就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；崑崙主山和西王母國，都在新疆。

有關黃帝在新疆活動的遺跡，記載很多。山海經大荒西經：「有軒轅之台，射者不敢西嚮射」。又云：「有軒轅之國，其人面蛇身」。又海外西經：「軒轅之國，在此窮山之際」。又西山經：「玉山西四百八十里，曰軒轅之丘」。淮南墜(地)形訓也有：「軒轅丘在西方」。西山經則說：「軒轅之丘，實為帝王之下都」。莊子至樂篇也有：「崑崙之墟，黃帝之所休」的記載。還有說苑、修文篇，呂氏春秋古樂篇，與漢書、晉書律歷志等古籍中，更有記述黃帝詔伶倫作

音律，曾遣他取竹於嶰溪之谷，(崑崙北谷)在崑崙山下聽鳳鳴，以作十二律的事實。此外，海內北經記有：「帝堯台、帝舜台、帝丹朱台、帝舜台，各二台，台四方，在崑崙東」。從上所記，所有中國古代的聖帝名王，在崑崙之墟，幾乎都有台、有丘，甚至有國。我們姑不問這些記載的真實性如何？也不必穿鑿附會，認為今日塔里木盆地中許多台地，可能就是上記的台、丘、國的遺址，但憑我們的常識就有理由追問：如果這個地區確與中國民族漠不相關，我們的古人為什麼一直對這地區繼續不斷地加以鋪張增飾？最少是從春秋戰國以來，對這地區依然念念不忘。尤其是穆天子傳裡也說：「……天子升於崑崙之丘，以觀黃帝之宮」。周穆王西遊紀錄的事蹟，曾經近代學者顧實、劉師培、丁謙、洪頤煊與衛挺生等，先後以科學方法，客觀精神，地上地下證物等可靠史料，與現代測繪地圖，博考詳析，疏通證明，確證是當時的實錄，使我們無法否認我國民族與文化的起源地是在西北。

此外，最顯明的史實，就是我國古代帝王，對於上述地區更有很多隆重遙祭的禮文。如周禮大宗伯：「以黃琮禮地」。依鄭玄的註釋，其所禮的就是崑崙之神。「琮」是「外八角而中圓」的禮器，禮崑崙之神而用黃琮，根據「禮神者必象其類」的原則，一方面固可說這位崑崙之神，就是「黃精之君」，也即黃帝。(見禮記郊特牲孔穎達，疏黃帝即「黃精之君」)另一方面實含有黃帝子孫或黃色人種，以崑崙之墟的廣大橢圓形地區為中心，向四面八方發展的意味。事實上表

示崑崙北麓的塔里木盆地，就是中國民族的起源地。為了「報本返始」，後來的周族雖已遠據中原，而遙祭典禮，累世相傳，仍舊不敢墜廢。又孔子曾說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」。而殷墟出土的禮器中正有琮，可見周禮以黃琮禮崑崙之神，正是「周因於殷禮」的一種明證，同時也可知道殷人本來即有遙祭崑崙之禮。因為殷人自命為帝嚳的後裔，崑崙之東原有帝嚳之台，所以殷人遙祭崑崙，正是遙祭他們的始祖，也即表示他們的始祖是從崑崙之墟發脈的。還有「后稷所潛也」的稷澤，也在這個地區，后稷是周人的始祖，且為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姜嫄所生，則周人的遙祭崑崙，說他們是祭始祖后稷固可，若說他們遙祭帝嚳也無不可。如更進一步說，在這地區建有軒轅之台，軒轅之丘，軒轅之國的軒轅氏黃帝，就是傳說中的堯、舜、禹、稷的共同祖先。這樣說來，殷周遙祭的崑崙，都是祭他們的始祖黃帝。從此可見，塔里木盆地為中國民族起源的地域，無論徵之於神話，或考之於禮文，甚至證之於科學，都是說得通的事實，並非專賴揣測或推論可比。

註：三皇的人選，有六說之多：有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為三皇的見春秋命歷序；有以天、地、泰為三皇的，見史記秦本紀；有以燧人、伏羲、神農為三皇的，見尚書大傳；春秋運斗樞及補三皇本紀，則以伏羲、女媧、神農為三皇；他如白虎通，風俗通所引，則以伏羲、神

農、祝融爲三皇；還有世本及帝王世紀裡，則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爲三皇。其實，把三皇看做三個人或擔任何人爲三皇，祇是假借三皇的記號，說明中國史前社會真實的演進。所以惟有韓非所提的有巢、燧人、伏羲三者，正可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由採拾經濟，而漁獵經濟而畜牧經濟的演進全部程序。

二、中西交通及文化交流的樞紐

今日一般世人，因受司馬遷說張騫通西域爲「鑿空」的影響，都以爲中西交通是張騫開始的。其實，這是一件錯誤。試想：當張騫到達大夏的時候，就曾看到在市場上已有四川出產的蜀布和邛竹杖。這很顯明地告訴我們，在張騫之前，就已有人到過西方（包括印度在內都稱西方）。

據英人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所著「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」(台灣商務印書館有譯本發行)一書裡，有說在銅器時代中國與歐洲已有某種程度的往來，非但爲技藝的交流，也有實物的交易。照 Leys 的說法，殷商以前中西即有往來，以致某類型的銅器、銅劍，散佈很廣。又說在中國宮廷最先實行的春耕典禮，而於歐洲社會也有同樣的舉措。他如「詩經」中的草本藥物，不但在中國廣泛應用，中古時的歐洲，甚至墨西哥也是一樣的採用。就世人所普遍知道的，中國傳布於西方的物品中，最早而極重要的可說是絲類。如在舊約聖經以賽亞(Isaiah)是紀元前八世紀人(第四十九章第十二節所記「這些從泰國來」

句，其下註明「秦原文作希尼，即 Si-nim，指的是中國人。而 Si-nim 一字的譯音爲「絲人」，即 Sienese。又以西結(Ezekiel)是紀元前六世紀人(第十六章第十節和第十三節所記的「絲綢」和「繡花衣」，都是中國的產物。這就是古代中西交通文字紀錄的憑證。據希羅多德(希臘史學家)書中所說，公元前七世紀時，自今黑海東北隅的頓河(Don River)河口附近，經伏爾加河流域，北越烏拉爾嶺，從伊爾的什(Ильши)而入阿爾泰、天山兩山間的商路，已爲希臘人所探悉。後來又於一八八四年穆勒(Muller)刊本中，載有克丹希亞斯(Ctesias)公元前四世紀人者，述及「賽爾斯人」(Seres)與印度北方人，身軀魁梧，男高十三英尺(由中指尖端至肘爲一英尺)，壽爲二百歲……」就此可知紀元前四世紀時，在西方希臘文獻中，就已有述及中國的情形。

又方豪所著「中西交通史」第一冊第四章內各節所引載，就已發現的文物言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，從公元前六世紀後，即中國春秋戰國時代，已有許多事物可以考證。這種關係接觸的路線，可分南北二路，北路是由西亞直接傳至北方民族，然後轉到中國，南路再由西亞傳至中亞、印度，而入中國。在此專講北路，因南路往來不經西北各省，略而不談。中國於周代中葉，還是以戰車爲軍隊主力，但到了周末，由於趙、秦二國最近北方，深知騎兵之可畏，車戰不足恃，乃效法匈奴，學習騎射，而學騎射，必先採用胡服，否則，便不能適應。所以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稱：

「趙武靈王(公元前三二五—二九九)年)獎勵胡服騎射」。既用騎兵，則軍隊服飾也必改採異族式樣，尤以馬上馳驅，最重要的護身鎧甲，當以輕便爲宜。自必鑿棄原以犀牛皮製成的硬重鎧甲，而代以鐵片練成或皮製小扣串成的伊蘭式鎧甲，因此，武器、馬具及其他配備等，也都改用外國式。

其次，講到美術與工藝上的外來影響，此與瑞獸有關，即所謂「動物考」(Animal style)。動物考的圖飾傳入中國後，而變爲中國的瑞獸。中國古時原有的動物圖飾，與西方的不同，三代古銅器上所表現的，線條硬直，姿態靜止，至秦式銅器出，便變爲寫實的動物紋；到了漢代，則更近於實物，虎虎有生氣，且在銅、漆、陶諸器及絹布上都有表現。這些動物紋概以騎射狩獵爲主，顯見它必定是淵源於游牧民族。

這些與騎術同於周末傳入中國的「動物型」飾品，其所以與中西交通有關，實因它有受西徐亞風格的動物紋影響。西徐亞位於南俄，前爲西徐亞人所居，故稱西徐亞式，動物紋就是這一帶地方所流行的一種裝飾。西徐亞藝術傳入中國的時候，適值中國古代宗法社會崩潰，原以儀禮爲主體，專重調和整齊的藝術。因受此種自由奔放的刺激，單調莊重的風格遂起變化，綏遠出土的青銅器，其種類有短劍、鉞、刀、斧及車馬裝飾等，都屬此類，即所謂綏遠式的匈奴文化。而此種文化，自西至東，其間歷經許多民族，所以難免有各地的特色。上述種種有係西域一帶各游牧民族的輾轉傳遞；有爲東來的商人，與中國溯

黃河而西去的商人，雙方在甘肅蘭州附近一帶接觸，而交換相互影響。

依照日本白鳥庫吉研究亞洲古今民族演變所得的結論，謂：「南北對抗，東西交通」。由於南北抗衡，則必旁逸而促進東西交通；因東西交通之發展，又往往重復牽動南北抗爭的形勢。當公元前六、七世紀之際，有七大遊牧民族分布於亞洲大陸之間，自東至西，幾乎並行而列如次：(一)阿里馬斯比亞 (Arimaspea) 人，在河西一帶；(二)以色列 (Isedon) 人，在塔里木盆地之東地區；(三)阿爾其貝衣 (Alerppei) 人，在準噶爾及其西一帶；(四)馬薩格太 (Massagetae) 人，其居處自點戛慈 (Kirghiz) 草原至錫爾河 (Sir Daria) 古稱藥殺水) 下流；(五)索羅馬太 (Sauromathae) 人，在裏海的北邊；(六)西徐亞 (Scythae) 人在西梅里安人稍東的地區；(七)西梅里安 (Cimmerians) 人，在今南俄一帶。後來因為在河西一帶的阿里馬斯比亞 (即中國史上所稱的月氏族) 忽然向西攻略，其他民族也就相繼受到影響，而先後被迫西侵，因此居於最西的西徐亞人和西梅里安人便侵入亞述，以至國勢衰微，終為米太人與加提人所滅。

白鳥庫吉認為最先西侵之阿里馬斯比亞人，其西進的原因，實由於我國春秋時代的五霸攘夷運動所致。蓋當五霸的齊桓公 (公元前六八五—六四三年) 晉文公 (公元前六三—五二八) 之興起，適在公元前七世紀的後半期，得管仲等的輔佐，先後九次會合諸侯，高唱尊王攘夷的論調，逐北狄、山戎於塞外，從此引起諸侯遷徙，推

波逐瀾，而有阿里馬斯比亞人的西移，逐步以推，所以亞述帝國的滅亡，其遠因實由於中國攘夷運動。也如日後大夏和安息之滅亡，肇因於漢代與匈奴的對抗而引起民族的遷徙；羅馬帝國之滅亡，其遠因也是由於中國阻止匈奴南下，及匈奴人被迫西移，乃有 Huni (此為拉丁文複數有認為西洋史上的 Huns，即我國史稱北方的匈奴) 族之橫行歐陸，引起日耳曼諸族的大動亂，終使羅馬帝國崩潰，其情形正相類似。上述白鳥庫吉的言論，很有可信的根由，並非中西各民族史實的巧合。

又據法國學者格魯塞所著「從希臘到中國」一書 (De la Grèce à la Chine) 闡述希臘文化東漸經過，以為古代文化有三大人文主義是最重要的，即希臘人文主義、印度人文主義和中國人文主義。由於三大人文主義的接觸，乃使世界文化更趨光明。希臘發現印度，印度又挾其佛教，而以希臘文物傳於中國，其所經路線，正昔日中國之絲綢往西方的舊道。但希臘文化之所以能東傳，則應上溯其歷史於亞歷山大東征時期 (公元前三三四至三二六年，即周顯王三十五年—四十四年)，其經過很是曲折。

希臘文化隨亞歷山大經伊蘭、阿富汗、而終與印度佛教相遇。亞歷山大在亞洲的主要繼承人為塞琉斯一世 (Seleucus)，他於公元前三二二年 (周赧王三年) 據有敘利亞，建立塞琉斯亞 (Seleucia) 王朝，迄於公元前六十五年 (漢宣帝元康元年) 始滅。塞琉斯古斯本人在位三十三年間，征服巴比倫、米太、帕提亞 (Parthia)

等國之外，並企圖拓境至印度，而與旃陀羅笈多發生關係，因旃陀羅笈多乃使佛教傳布于印度境外的一個最有力者；而佛教本身，在藝術方面也曾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，所以佛教所到之處，也就成為希臘式的國家。在東方的希臘化國家中，當以大夏為最重要，其轄地南達信度庫斯山，北至古代所稱的烏澹河 (Oxus)，即今日的阿姆河。公元前二五〇年 (東周惠公六年) 大夏王第奧道脫一世 (Diodote) 脫離塞琉斯古斯國人的統治，宣告獨立。那時中國與大夏等希臘化的國家雖未正式發生關係，但由於商人和旅客居間為之媒介，使波斯或印度的關係，因而影響希臘與中國的關係，這是無可置疑的事。

從匈奴活躍的時代及其遷徙的路線看來，匈奴最初的文化，應是純粹西伯利亞式，後來受到秦漢的影響，乃加入中國文化；到了西侵月氏，西域諸國都歸所屬以後，則又加入西徐亞文化。於是公元前一世紀盛行於黑海以北的青銅器文化，即所謂西徐亞文化，乃隨匈奴的勢力，而流入蒙古與西伯利亞。其後匈奴分南北為二，南匈奴移徙於中國內地，完全漢化；北匈奴則遷往歐洲，而同化於希臘、羅馬。所以匈奴本身並無獨特的文化，但對東西文化的傳播，却有很大的貢獻。再匈奴的行踪及於亞、歐二洲，其文化的成份以西伯利亞和西徐亞為主，參以中國、希臘及伊蘭諸系，而成為世界性文化。民國十三年 (公元一九二四年) 科茲洛夫蒙藏探險隊，在庫倫北七十里，位於庫倫、恰克圖大道東七公里的地方，發掘古墓三群，凡二百二十一座，從發現的織

物 and 花絹，得知與斯坦因在樓蘭發掘獲得的時代相同，由掘獲繡織物中所見的藝術型，就有中國、波斯和希臘式。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研究員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，也就實地探查的結果，撰成「內蒙古長城地帶」一書，其中第二篇言及「綏遠青銅器」，也說綏遠的青銅文化含有中國式和西徐亞式，所以稱它為「北方歐、亞文化」。從此可知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，我國古代的西北實為其樞紐。

三、古代絲綢西傳的發軔地

中西交通最顯著的事實，就是中國絲綢的西傳，也即中國物質文明西傳的正式開端。中國絲的發明，史籍所載為黃帝的元妃嫫祖，教民育蠶，治繭織絲。尙書禹貢謂：「兗州厥貢漆、絲、厥篚織文；青州厥篚絳絲；徐州厥篚元纁織；揚州厥篚織貝」。篚是竹編長三尺，廣一尺，深六寸，足高三寸，方形有蓋的竹器。可見我國古代蠶絲發明之早，及其織物產地之廣更以人工的精密，與應用的繁多，遠勝於同時代西方各地的任何產品，實為我國古代最優的文明產物。

中國的絲早已聞名國外，並於漢武帝以前曾經輸出。除在上面所述舊約聖經以賽亞和以西結兩書中的文字記載外，又在克里米亞半島哥特齊附近古希臘人殖民地的遺跡中，也曾發現有絲。此外，如光緒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〇〇年）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絲織物的殘片；光緒三十二年（公元一九〇六年）及民國三年（公元一九一四年）斯坦因也在同處發現大量殘絹；此後法國考古團

在波斯也有發現。所以在公元前六世紀時，中國的繒帛，就已越過帕米爾，而至印度、波斯和猶太各國。到了亞力山大東征以後，便又經敘利亞輸入歐洲。

至於絲商，在史記貨殖傳內有載：「鳥氏保、畜牧。及聚斂買求奇繒物，間歇道戎王，戎王什倍其價，與之畜。畜至用合量馬牛。秦始皇帝使使封君，以時與列臣朝請」。方豪先生解釋謂：「鳥氏，地方商人之名。保者，以畜牧起家，畜既多，乃以之出售，而所以所得收購精製之絲貨，從間道運銷國外，獲利十倍，即購中國所最需的牛馬。如此輾轉貿易，『鳥氏保』竟成巨富。所獲牛馬，不知其數，秦以封君視之，並請他前來朝中，參與國家大事」。（見中西交通史）又漢代絲業普遍發達，幾乎無家不從事於產絲。如「西京雜記」裡載：霍光妻、陳寶光妻都能織絲。「六日成一匹，匹值萬錢」。漢書張陽傳：張安世夫人自織外，又率七百家僮共織，乃成大富，過於霍光，富貴人家如此，其餘可知。

絲之西傳，雖在漢武帝之前，而古絲道的正式通行，應起於張騫出使西域之後，開始發展了絲的貿易；大隊商旅由中國前往伊朗，應追溯到漢武帝即位後三十四年的元封元年（公元前一〇六年），那時由於漢武帝對中亞細亞施行強力外交活動，與軍事政策的結果，其版圖實已西越中亞細亞以達西土耳其斯坦，所有西域諸國都已為中國的藩屬，因此絲道也就由此建成。照沙畹和許多人的意見，以為自甘肅經河西沿南山脚下（即祁連山脚），經由一連串沙漠中綠洲的通路

，是中國與古文明伊朗地區的交通路線。在公元前一二〇年時，中國輸出絲綢物品的路線，經過考證的結果，大略如下：從南山脚下穿過黃沙地帶的城市——涼州、甘州、肅州、安西到敦煌。敦煌以後的道路，便分二途：一從西藏高原北行，另一途是約於第五世紀通行，經沙漠吐魯番，轉向天山之南西行。這兩條路線，一是避開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。此外，第三條路線，是從敦煌之西不遠的古玉門關，與上述的北道分開，越過羅布泊旁的樓蘭再向西行，但因第四世紀以後，這一地區更加乾燥，便不經樓蘭城，而放棄了這條路線。這幾條路都在新疆之西，接近俄國邊境的喀什噶爾會合；合而又分，一條經某關口，入某地區，穿過某處以達到 *Margiana* 的 *Aul-i-och*。另一條則由喀什噶爾經大夏，到 *Merv* 越帕米爾，其所經的下一條路，今尚未能證實，可能包括 *Tau-Murgh* 關在內。沿這條路走，途經西塞「石樓」，雄立於大夏邊境，是古代著名的地方。過了 *Merv* 以後的路就好走了。橫穿伊朗，經由古安息的首都和現代的 *Bandan*，到底格里斯的河邊，就是現在巴格達下面的地區。從敘利亞以西，就有很多條路進入歐洲。

Hudson 把整個絲路分為四個段落：（一）由中國內地西行至新疆邊境帕米爾地區；（二）從帕米爾到 *Merv* 的若干沙漠中綠洲，即經由大夏或 *Sogdiana* 境界，便可依照需要決定取道南北兩路；（三）由 *Merv* 到現代的伊拉克；（四）由伊拉克的 *Selenceia* 到羅馬邊界。這四段路程，最初一段和最後一段最難行。在甘肅和喀什噶爾之間，

民族複雜，有西徐亞人、匈奴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和中央亞細亞的許多小政權（城邦），西來的人可能與這些游牧民族作啞子式的吃虧交易。

東漢一代，絲的生產更有過剩，所以鹽鐵論賢良有說：「今富者繒繡羅綺，中者素綈錦永。常民而後妃之服，娶人而居婚姻之飾」。到了班超總督西域時期，其勢力遠及裏海。因此絲的貿易得以繼續發展，經向安息以達羅馬。歐洲人對於中國的絲十分愛好，羅馬人一向浮華，更是喜好絲綢。那時羅馬已有製作精良的玻璃器具，和毛、棉織品等，在亞洲到處有它的市場，可是羅馬輸入絲的貨值，却遠超過它輸出物品的總值，所以有人說這是羅馬經濟衰落的主因。但中國的絲，都由波斯人輾轉運往西方，他們得有機會作中間人而大賺其錢，所以羅馬帝國雖然極欲與中國直接發生關係，以消除安息人對於絲綢貿易的壟斷，而終為安息人竭力加以破壞。據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載：「……其王常欲通使於漢，而安息欲以漢繒絲與之交市，故遮闕不得自達。」由此陸路的阻滯和剝削太多，因有另闢海上交通的必要。如循海道，則由交、廣登陸，不經西北甘肅，在此自不必論。

據班固所修漢書西域傳，與范曄所作後漢書西域傳中所載，自玉門關以西，地中海以東，印度以北，裏海以南各國的土地山川，王侯戶數，道里遠近，都有詳細的敘述，對於兩漢中西交通的路線也很明瞭。原來說有南北兩道，都始於漢初，且都要經過羅布泊低地而向西行，一傍南山，一沿北山，至後漢則另有新道，不經羅布泊。

漢初的南北道，向以出陽關為南道，出玉門關為北道，但據史學集刊五期有「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」一文，作者以實地考察及研究文獻所得，謂：「余疑漢時玉門、陽關兩者相距不遠，自此西行原祇一路，出玉門關者由之，出陽關者由之，至沙西井後再分南北兩路進行」。斯坦因之土耳其斯坦與甘肅地圖稱沙西井為Kuna Kunduk，意即沙井。這就該注意，把古代玉門的地址究在何處考查明白。

所謂「新道」，是由玉門關即今大方盤城起，折向西北行，經橫坑，避三隴沙及龍堆，出五船北而達車師（即高昌），就是現在吐魯番阿斯塔拉。自玉門關至車師，必須取道羅布泊海的東北，直達魯克沁南的得格爾。

按魚豢魏略載，還有所謂「中道」：「從玉門關西去，發都護井，迴三隴沙北頭，經居盧倉，從沙西井轉西北，過龍堆到故樓蘭，轉西詣龜茲，至葱嶺，為「中道」。其實，中道就是漢初的北道，惟西漢末年，一度封閉，至魏晉時又恢復通行，所以見於魏略。中道又稱經道，因為北道行於順順戈壁的東邊轉西，沿庫魯克山的北麓；要繞庫木什山，取道焉耆，才到尉犁，而中道則可直接到達尉犁，較為近捷。

又據斯坦因發現的西域路線，與一九一〇年海爾曼Albert Herrmann 所著「中國與古敘利亞間的古絲路」一書，對於敦煌以西的絲路，考證很詳。原書一一五頁所記，中道七星期行程，一千七百公里；南道八星期行程一千九百公里；北道九星期行程，二千一百公里。後漢明帝時

，重開新道，以新道為北道，中道廢。自魏至晉，重開經道，以經道為中道，就是唐時的銀山道，也即後漢書中所記的北道。所謂「北道」、「中道」、「新道」，時常發生混淆，不易清楚。

總之，古代絲路都由甘肅河西敦煌而出國門，經安息而達於敘利亞人的貿易中心地，如安底奧基亞Antiochia，大馬斯柯Damascus，彼脫拉Petra等處。後來羅馬人為免安息的操縱，曾另由高加索渡紅海北行。但在第一世紀的中西通道，都以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為樞紐。

再於查爾士華次M. P. Charlesworth 所著「羅馬帝國之商路及商業」(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)第六章中說敘利亞的底爾Tyre和貝來都斯Berytus為敘利亞盛行絲服的兩大城市；羅馬人所用的絲綢，也在上述二地織成。所以各地絲商都雲集這兩處。埃及王后喀里奧巴脫拉(Cleopatra)的赴宴盛服，就是在底爾製成的。所以古代的絲路，實可稱為舊世界最長交通的大動脈，為大陸國家文化交流的空前最大聯絡線。可惜當時長安、洛陽的中國商人，並不知出售的絲將遠至何地；即居中為媒介的吐火羅人、大夏人、安息米太人、敘利亞人，也不知最後享受者是什麼人；祇有底爾、貝來都斯、敘利亞盛行絲服的兩個大城，與地中海海口的腓尼基水手，才知道羅馬為其主要市場。

主要參考書籍

「何福同著『現代歐美漢學家對於中國文化之研討』中(一)『中國的興起與其光輝』及四『中國科學技術史』。
「方豪著『中西交通史』第一冊第五章第三節『中國絲綢之西傳』第八章第二節『前後漢中西通道之變遷』，及第九章第三節『絲綢之大量西銷』。

書名：立法院人民請願案研究

作者：曾濟群

定價：二九元

凡民主法治國家均允許人民有請願權，我國憲法亦明載之，然有關行憲後人民請願權行使情形，人民向立法院請願申請數量？應以何種方式提出？人民請願權之行使與立法院關係？本書均根據原始資料，切題加以分析統計，俾助讀者抓住問題核心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書名：比較憲法

(66年7月出版)

作者：張亞遷

定價：二九元

憲法分類甚多，包括一權、二權、三權、五權、平時、戰時等類別。本書乃針對以上類別加以比較研究，凡晚近東西方憲政民主學術的立論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理論，以及與憲政民主，密切相關的民權、言論自由兩大問題，均一本精深的觀察，施予平實的批判討論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基本材料科學

曹正樓 編著

定價：一百八十元正

在現代科學的領域中，材料科學是發展較遲，但却最被重視的一門科學。材料科學之所以受到世人重視，數其原因，固非一端，但最重要的是由於時代的進步，人類的進步，人類對各種材料的需求不斷提高，並且與日常生活、社會建設、乃至國防工業相結合。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，材料科學的專業化就應運而生。

作者深感目前國內大專院校所採用之工業書籍多為外國原文本，對於有志於材料科學研究發展方面的讀者，難免有窒礙之處。為收事半功倍之效，作者根據多年講授之心得，配合多方面所集之資料，自材料組成的基本原理，以至材料的應用，作一系統的介紹，並以圖片加以說明，以增進讀者的瞭解，可滿足學者的需要，進而藉著已有的材料知識，去研究發展及探求更新的材料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